

个体化与共同体危机

——以 80 后作家上海想象为中心

黄平

一切的路都朝向城市去。

——维尔哈伦(Verhaeren),《城市》

为什么要让不爱上海的人出生在上海?

——郭敬明,《生活在别处》

这个城市里已经没有梦想。

——韩寒,《城市,让生活更糟糕》

1999年3月28日,星期天,上午九时左右,上海南郊金山区亭林镇亭东村的韩仁均先生接到一个电话,对方是上海作家协会《萌芽》编辑胡玮蔚,询问他的儿子韩寒为什么没有参加昨天“新概念作文大赛”的复赛。韩仁均惊讶地告诉对方并没有收到复赛通知,胡玮蔚表示评委会同意把复赛的机会保留到中午之前。显然,留给韩寒的时间不多了。韩仁均大声叫醒了儿子,父子二人冲出家门拦住一辆车,以疯狂的速度驶过郊区颠簸的公路,开往六十公里外遥远的上海市区。像好莱坞电影一样,主人公在最后一刻赶到了。“新概念作文大赛”总干事、评委李其纲先生将韩寒带到补考的房间里,随手将一张揉成团的白纸丢进水杯,告诉韩寒这就是题目。一个小时以后,韩寒完成了一篇《杯里窥人》的作文,这篇借着纸团慢慢在杯中浸开来冷嘲热讽社会对于人性污染的作文,获得了首届“新概念作文大赛”的一等奖。获奖的当天下午,韩寒在细雨蒙蒙中坐着公交车返回松江二中,在乱糟糟的宿舍里继续写作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三重门》。当时的韩寒很难预料到,十多年之后,第十四届“新概念作文大赛”复赛的题目是《韩寒》。

不仅是韩寒,“新概念作文大赛”召唤出一代青年作家。他们凭借“新概念”的平台成名,先后汇聚在上海这座大都会,写城市,也为城市里的读者写作。对于过去十年的中国文学图书市场而言,这批青年作家成为市场的风向标,作品一版再版,读者数以百万。拥有悠久的乡土文学传统的中国文学界,一直苦于找不到书写城市的方式,这批

和“改革”同龄、出生在城市中的青年作家的作品,正在以不同的艺术方式,描摹城市一代成长中的灵魂。

对于传统的中国文学而言,这是一次深刻的断裂。文学界一般以两种方式消化这一断裂,或者将这批作家作品视为“青春文学”,一种不成熟的、逃避现实的、青年人写给青年人看的文学,或者视为“市场文学”,不无轻蔑地认为这是一种新的通俗文学,同时强调还有另一批80后作家依然坚守着“纯文学”的传统,只是他们的名声被大众对于韩寒、郭敬明的追捧而淹没。和文学界的普遍冷遇不同,这批青年作家——尤其是直面公共议题的韩寒——在海内外传媒上受到隆重对待,韩寒先后被《南方周末》《亚洲周刊》《新世纪周刊》选为年度人物,被《时代》周刊选为“全球有影响力人物一百人”,被《外交政策》选为“全球百大思想家”。2010年3月12日出版的《纽约时报》将韩寒视为“可能是目前在世的最受关注的作家”。与之对比,有另一种声音认为韩寒、郭敬明都是“抄袭者”,郭敬明《梦里花落知多少》抄袭庄羽《圈里圈外》事件已经在2006年由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终审宣判,认定郭敬明抄袭成立,韩寒早期作品则被方舟子疑为韩仁均代笔,这一事件成为2012年的大众传媒热点,但一直缺乏有说服力的证据,也有很多人指出对于韩寒的批判,实质是基于对韩寒政治立场的不满。

在偏见、闹剧与粉丝式的追捧之外,本文尝试严肃对待这批作家,以韩寒、郭敬明为代表,历史化地考察80后文学的兴起,并且以韩寒、郭敬明对于上海的想象为中心,讨论80后文学如何处理不断城市化、现代化的中国,这场文学运动与当代中国的历史进程如何互相形构。和世纪初类似,上海在世纪末再次成为“新青年”的策源地。“新概念作文大赛”发生于上海,80后作家汇集于上海,新一代作家开始讲述既“新”又“古老”的“上海故事”。

一、“新概念作文大赛” 与 80 后作家的出场

且回到作为80后作家出场标志的“新概念作文大

赛”。这场比赛起因于上海作家协会《萌芽》杂志的改版,而《萌芽》改版首先是一次经济救赎。“创刊于1956年7月的《萌芽》杂志是新中国第一本青年文学杂志,刚一创刊,就获得广大读者的欢迎。创刊号发行3600册,一年不到就达到20万册,在文学界和青年读者中产生了很大影响。”然而,《萌芽》在办刊过程中长期伴随着资金紧张。早在1984年,《萌芽》就设想过针对上海中小学生学习午餐难的问题来组建快餐派送公司“以副养刊”经济的窘境可见一斑。

这种困境在90年代全面市场化改革后愈演愈烈。赵长天在1995年接任《萌芽》主编时,杂志发行量只剩下一万多份,读者群不断萎缩。赵长天开始了第一次改革,大规模地引起“市场经济”的思路,“既然明确文学杂志是商品,那么对于商家来说顾客是上帝,对于杂志来说读者就是上帝。我们反复强调树立市场意识。”延续这一思路,赵长天开始细分市场受众,“寻找”他的读者,“在那么多的杂志并存的情况下,每本杂志都要有细分的读者对象。‘青年’还是一个太笼统的概念。经过分析和实践,最终把‘我们的读者’定位为以高中生为主体的爱好文学的青年学生。”从1996年1月开始,赵长天率领《萌芽》团队开始了第一次改革,“1996年1月开始的改版指导方针是摸索文学和市场的切合点。在当时青年学生对《萌芽》一无所知的情况下,我们首先考虑的是怎么吸引他们的眼球。在杂志最醒目的位置,我们不像以前通常所做的,放最好的小说,而是刊登学生关心的热点纪实作品。比如当时非常热门的申花足球明星的报道等等。读者可能是为了看自己关心的热点而买《萌芽》的,买来后,或许他们会再看看别的内容,比如小说、散文、诗歌。”这次改革不算失败,但成效不大。赵长天后来回忆:“经过一年的努力,刊物销量上升了一倍。但是,两万多的发行量,离我们的目标还是很远。我们经过调查和分析,发现主要原因是杂志刊登的文章,基本作者都是中年人,这些文章和我们期待的读者的兴趣有距离。或者说我们的作者和我们的读者有代沟。我们应该多刊登年轻人自己写的文章。”

赵长天的“改革”逐渐抓住了问题的关键,与其迎合“读者”,不如更有生产性地制造“读者”,通过“年轻人自己写的文章”,循环性地生产出“文本”与“读者”、“想象”与“身份”。在彼此指认、辩证共生的关系中,在青年共同体的网络中激活《萌芽》的能量。1998年赵长天开始了第二次改革:“新概念作文大赛”。“新概念作文大赛”出台的背景,在于1997年爆发的“语文教育大讨论”。1997年第11期的《北京文学》以《忧思中国语文教

育》为题,刊登王丽《中学语文教育手记》、邹静之《女儿的作业》、薛毅《文学教育的悲哀》三篇文章,揭示语文教育严重弊端,成为轰动一时的热点话题。《中国教育报》《中国青年报》《光明日报》《文艺报》《新民晚报》等媒体纷纷转载,并就语文教育问题刊发大量评论文章。中央电视台、中国教育电视台同时跟进,制作了相关的专题节目。据当事人王丽回忆,文章发表后几个月,当时主管教育的领导人作出批示,有关部门邀请她参加了全国语文中考改革指导会议,启动了世纪末中国语文教育改革。

在这样的改革浪潮中,《萌芽》顺势推出“新概念作文大赛”,邀请国内一流的文学家、编辑和人文学者担任评委,定于1999年1月1日起,每年举办一次,分为初赛与复赛,复赛地点设在上海。参赛对象分为三组,A组是应届高中毕业生,B组是除高三以外的初高中学生,C组是除中学生以外30岁以下的青年人。《萌芽》就此发表《“新概念作文大赛”倡议书》,开篇就谈到“自1997年年末肇始,整个中国的舆论界对中学语文教育投以了极大的关注”^①。《倡议书》认为,“中学语文教育的种种问题,概言之,是将充满人性之美和生活趣味的语文变成机械枯燥的应试训练”^②。在《新思维 新表达 真体验——“新概念作文大赛”征文启事》中,《萌芽》将自己对于理想作文的设想,概括为“两新一真”:

“新概念”旨在提倡:

“新思维”——创造性、发散型思维,打破旧观念、旧规范的束缚,打破僵化保守,无拘无束

“新表达”——不受题材、体裁限制,使用属于自己的充满个性的语言,反对套话,反对千人一面、众口一词

“真体验”——真实、真切、真诚、真挚地关注、感受、体察生活^③

“新概念作文大赛”的倡议书与启事显而易见是对于应试教育的批判,但饶有意味的是,倡议书也表达了成为“语文奥赛”的渴望,“应该指出的是中学的许多基础学科,如数学、物理、化学都已经有了全国性的奥林匹克大赛,而唯独作为从小学到大学(包括理工科大学)都要学习的语文学科却没有与之相称的全国性大赛形式。”^④而且,“新概念作文大赛”能够从无数作文竞赛中脱颖而出,正在于征用了体制的力量,巧妙地联合七所重点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南京大学、南开大学、山东大学、厦门大学),承诺“获奖的或入围的应届高中毕业生将进入七所著名高校重点关注范围,视其具体情况予以提前录取或

优先考虑^⑤”,并在获奖作品选封底印上“获奖者被全国重点大学免试录取名单”,由此搭建了一条保送大学的民间路径。有研究者分析道:“现在看来,‘新概念’的成功离不开《萌芽》对传媒资源和教育资源的巧妙整合——创造一个极具诱惑力的承诺:进入名校深造的‘直通车’,即与大赛合作的名校达成协议,承诺优先免试录取大赛获奖者。据悉,仅1999年第一届、2000年第二届的新概念作文大赛中,就有21名一等奖获得者被各知名高校破格免试录取。”^⑥某种程度上,这种既叛逆又体制化的充满矛盾的统一,对于80后文学的发展有微妙而深远的影响。

更重要的是,“新概念作文大赛”所规划的“新”与“真”,指向着对于“新人”的询唤——这既是《萌芽》渴望的“作者”,也是《萌芽》渴望的“读者”。这里的“新”与“真”不是泛泛的说教,而是有其特定的内涵。就当时的语文教育改革而言,批判者列出了一批“不合格”的中学课文,比如《纪念白求恩》《谁是最可爱的人》《荔枝蜜》^⑦。秉持左派立场的刊物不同意这一点,曾组织专辑予以辩论,尽管那类大批判的语言与逻辑值得商榷,但有一点观察是准确的:“改变教材,归根结蒂是为了改变人心。”^⑧对于“新概念作文大赛”,有研究者指出:“在评选过程中,‘人性标准’和‘审美标准’代替了‘政治标准’和‘道德标准’成为引导参赛者写作的标杆。在传播在成人文学界业已成为‘主流’的文学观。”^⑨“人性”与“审美”提供了一种新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的核心是“个人”,一个去政治化的、反共同体的个人。正如贺桂梅的分析,“感性、情感、体验等个体主观经验被作为跨越人的分裂式生存的解决方式,个人可以在‘审美’之中成为一个完整的正体,从而试图更为干净地撇清其与国家/社会等社会组织形态之间的关系。”^⑩“新概念作为大赛”之后,青年写作中“我”大行其道,个体的内心体验被放大到无以复加的地步。

以“个人”为核心的意识形态,构成了80后诞生的基点。在“关键词”的意义上考察80后的谱系,这一命名最早出现在2003年“萌芽小说族”丛书的宣传:《萌芽》与浙江文艺社联手再推文坛80后^⑪。随即,2004年2月2日《时代》周刊亚洲版选择北京二十一岁女作家春树(《北京娃娃》作者)作为封面人物,在《新激进分子》(The New Radicals)的封面报道中,将她和韩寒视为中国另类青年的代表^⑫。伴随着海内外大众传媒的介入,80后这一命名溢出了文学领域,成为出生于1980—1989一代青年的标签,构成了理解这一代青年的视角。几乎被遗忘的事实是,80后既起源于80后文学,又深

受80后文学的形构,文学在当下中国并未边缘,只是更为隐秘地发挥着作用。正如李阳的分析:“当《萌芽》转化为中学生之间的交流媒介以后,就不仅将中学生话语解放到纸媒介中,同时也把中学生这一社会身份鲜明地生产了出来。中学生话语和身份在符号意义上构成了自足的互相生产的关系——把自己的故事不断地讲给自己。当然,所谓中学生(更流行的说法是‘80后’),与其说是一个具体的社会群体,不如说是一个被建构的文化身份。”^⑬由此,80后文学既让80后一代变得可见,同时也限定了80后想象的可能性。

郭敬明所命名的“小时代”到来了,《萌芽》有效地迎合了一代新人的历史性登场,迎来了全方位的成功。据赵长天回忆:“新概念作文大赛之后,《萌芽》发行量直线上升,2000年达到了10万份。其后,每年以10万份增加,2005年每期平均发行50多万份。”^⑭推崇“市场”的赵长天,打造了自己的市场产业链:“杂志、大赛、书系、网站、学校已经初步形成了一个萌芽产业链。”^⑮在市场上大获成功之后,《萌芽》也收获了国家意识形态的肯定:“2005年《萌芽》杂志获得第三届国家期刊奖,被列为百种重点期刊。同年,萌芽杂志社被评为上海市宣传系统第一届文明单位。”^⑯这种左右逢源、皆大欢喜的结果,显示出单纯以“市场”或“国家”为视域分析当代中国都显得褊狭,无论左翼或右翼的理论,都无法充分揭示当代中国的剧变。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新概念作文大赛”与80后作家的登场,代表着城市化进程所构建的新主体与新文学。城市化进程推动着青年一代的主体重构,这一代“新人”的心灵印记与情感结构将在“80后文学”中显影。

二、“小时代”的上海想象

作为中国最现代的城市,上海让四川省自贡市富顺县的高中生郭敬明无限向往,在高三的作文中,他写道,“是谁说过,燃亮整个上海的灯火,就是一艘华丽的邮轮。”^⑰“我的根似乎是扎根在上海的,就像人的迷走神经一样,一迷就那么远。这多少有点不可思议。”^⑱相比而言,“我的城市多少有些令人啼笑皆非。一句话,它是一个像农村一样的城市,一个像城市一样的农村。”^⑲“新概念作文大赛”为郭敬明打开了通往上海之路,他以《剧本》(第三届预赛作文)、《假如明天没有太阳》(第三届复赛作文)、《我们最后的校园民谣》(第四届预赛作文)等作文连续获得第三届、第四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2002年郭敬明考入上海大学影视艺术工程专业,开始长久地生活在上海。

作为郭敬明文学之路起点的《剧本》,编织了一个关于“社会角色”的寓言,文章设置了三个人物(左岸、右岸、“我”),代表着三种社会角色在现代社会的命运:左岸偏激、冲动,是一个摇滚乐手、诗人;右岸则是规矩温顺的职员,“每天早上坐同一时间的地铁坐同一个座位去上班”^⑧;“我”就像河床一样,在左岸与右岸之间,承担着生活的河流。只有在多元的、流动的现代社会,以及在现代社会中“自我”(self)的观念诞生之后,扮演怎样的“社会角色”才构成一个挑战。《剧本》这篇显得幼稚的作文,已然表现出少年郭敬明对于“社会角色”的敏感,他清醒地明了“社会角色”不过是一个文化构造物,就像说台词的戏子,带有表演性。莱昂内尔·特里林精辟地指出这一点,“真诚的观念,自我的观念,认识并展示自我之艰难的观念,开始在戏剧突然昌盛的时代兴起并困扰人类,这绝非偶然”^⑨。

在《假如明天没有太阳》中,郭敬明用雕琢、抒情的文字(“安静的夜”“隐隐浮动的霓虹”“墨蓝的天壁”等等)塑造了一个“我想快点快点快点回家”的“孩子”,伤感且莫可名状,所谓“有一种烦恼是莫名其妙的”^⑩。在蝉联冠军的第四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中,郭敬明再次重复了这种美学策略,《我们最后的校园民谣》和校园民谣本身一样伤感,在盘点高晓松、老狼、叶蓓、沈庆等民谣歌手之后,郭敬明选择以民谣式的句子结尾:“我们最后的校园民谣,夕阳下我向你眺望,你带着流水的悲伤。”^⑪

在这批早期的获奖作文中,郭敬明已经开始展现他的特长:他善于描写一类特别的“自我”,忧伤、唯美的个人主义者,或者说“精致的利己主义者”^⑫。在郭敬明的小说中,个人是觉醒的,然而这种“觉醒”和外在的世界无关,指向内在的情绪与体验,“自我”到近乎自私、自恋的地步。

这样一类“脱历史”的自我,如何与当代中国的城市生活相遇——郭敬明来到上海后的小说,无论他是否意识到,都围绕这一点展开。在《幻城》(2003)所编织的唯美、空洞、自我无限膨胀的奇幻故事大获成功后,郭敬明选择休学专事写作,并于2006年成立“上海柯艾文化传播有限公司(CASTOR)”,成为80后作家中第一位以文化公司的方式运作文学生产、发行与推广的文化资本家。在2007年,郭敬明推出第一部描写上海生活的长篇小说《悲伤逆流成河》,这部小说是郭敬明迄今为止唯一带有“底层”味道的作品。故事发生在上海这座国际大都会的暗影里,石库门那些逼仄、潮湿的弄堂之中,讲述善良的富家子弟齐铭与弄堂里的单亲少女易遥的残酷青春。过于敏感的爱情与过于曲折的情节,摧毁了青春

期的主人公,同时牢牢抓住了同样处于青春期的读者。据郭敬明自述,《悲伤逆流成河》在当年“五一”七天长假中售出惊人的一百万册。不过,无论怎样受到欢迎,郭敬明所擅长的伤感故事,在这部作品中变得过于沉重。毕竟,这个故事涉及流行的“上海故事”所需要回避的阶级差异。

郭敬明很善于调整自己,一年之后推出代表作《小时代》三部曲的第一部《小时代1.0折纸时代》。从老城区到陆家嘴,炫目的、繁华的、流光溢彩的上海扑面而来,小说以下面这个段落开始:

翻开最新一期的《人物和时代》,封面的选题是《上海与香港:谁是未来的经济中心》——北京早就被甩出去两百米的距离了,更不要说经济疯狂衰败的台北。

每一天都有无数的人涌入这个飞快旋转的城市——带着他们的宏伟蓝图,或者肥皂泡的白日梦想;每一天,也有无数的人离开这个生硬冷漠的摩天大楼组成的森林——留下他们的眼泪。^⑬

这种对于上海都市景观近乎膜拜的赞叹,贯穿小说的全书。陆家嘴的摩天楼群,作为标识何为“现代”的景观,构成了一种“物化的世界观”^⑭。然而,对于摩天楼群的景观,《小时代》的主人公既是惊叹者,又是旁观者,她分享的位置是“看”。这是让她激动的城市,但不是她的城市。无论是金茂大厦还是环球金融中心,真正的持有者是国内外一流的财团。“小时代”里的人物与权贵阶层的关系只有两种:家族关系与雇佣关系,前者以顾里为代表,后者以林萧(即叙述人“我”)为代表。舍此无他,政治参与、社会运动、舆论监督、文化批判等等一概付之阙如。

郭敬明不是没有感知到这一点,只有缺乏足够的勇气正视,并且慢慢地通过文化公司的运作成为资本链条上的一环。在《小时代》中,郭敬明将“资本”的气质掩饰为“男性”气质,最多是一种“怪癖”,比如《M.E》主编宫铭不允许主编助理林萧使用逗号和句号之外的标点符号,林萧的同事告诉她,“意义在于逗号和句号可以表现出我们的冷静和有条不紊,任何时候我们都是被设定成这样的机器人!”^⑮对于资本时代的冷漠法则,匮乏参与可能性的年轻一代,充满了无力感,郭敬明也诚实地表达出这一点,“财富两极的迅速分化,活生生把人的灵魂撕成了两半。我们躺在自己小小的被窝里,我们微茫得几乎什么都不是。”^⑯“我们活在浩瀚的宇宙里,漫天漂浮的宇宙尘埃和星河光尘,我们是比这些还要渺小的存在。”^⑰

合乎逻辑,《小时代》的故事都发生在“内景”。从上海大学女生宿舍到毕业后主人公们租住的静安别墅,从顶级

写字楼到豪宅里的 PARTY, 郭敬明的小说是文学版的“室内剧”, 大上海流光溢彩的景观, 与主人公的生活没有发生真正的关联。和第一部“室内剧”《渴望》在 1990 年饶有意味地播出一致, 激荡在十字街头的能量变得衰微, 一切都被吸纳到个人空间之中。和《子夜》《上海屋檐下》等上海故事将政治波澜作为故事的推动力不同, 在《小时代》之中, 故事的推动力依赖人物间的对话与人物爱恨关系的调整重构。

郭敬明的经典主人公就是这种被中国特色的现代性囚居在内室中的主体, 始终处于一种不成熟的状态。郭敬明将这种状态指认为“孩子”, 他安于这种无法长大的状态, “一个永远也不肯长大的孩子也许永远值得原谅”^⑩。郭敬明的上海想象、美学风格与叙述策略, 都是围绕“孩子”而展开。在《小时代》之中, 顾里、林萧、南湘、唐宛如四个同宿舍的女孩子组成了“小共同体”, 以抱团取暖的方式, 扮演着“大时代”的局外人, “小时代”的剧中人。然而, 这种与历史疏离的态势无法持久, 《小时代》三部曲结束于“胶州路大火”。

郭敬明安排他的所有人物在胶州路 707 弄 1 号聚会, 时间是 2010 年 11 月 15 日。在现实世界中上海同一天同一地点爆发了震惊全国的火灾, 五十余人葬身火海。现实中的“上海”终于无比酷烈地闯进“小时代”的世界中, 将里面的男男女女焚烧干净。

这样一个猛烈而意味深长的结尾, 提升了《小时代》三部曲的境界。在小说结尾, 劫后余生的林萧离开了上海, 在漫长的岁月里反复做同一个梦: 阳光明媚的大学寝室, 她和女伴们穿着睡衣挤在沙发上窃窃私语, “我们俩的头发都又长又黑, 长长软软地披散下来, 缠绕在一起, 分也分不开”^⑪。“上海梦”化为灰烬, 宛如幻城一梦。郭敬明写完《小时代》最后一行, 是否会想起自己十四岁时发表的处女作《孤独》, 这首预言般的小诗结束于这一句: “我们不知道要去哪里”。

三、游弋在“他的国”

韩寒也未必知道要去哪里, 但是和郭敬明不同, 韩

寒的主人公永远“在路上”。“新概念作文大赛”与《三重门》的成功, 韩寒很长一段时间去玩赛车, 几年内成为中国汽车锦标赛场地赛、拉力赛双料冠军, 目前是中国最出色的赛车手。同时, 他继续着自己的写作, 连续出版《长安乱》(2004)、《一座城池》(2006)、《光荣日》(2007)、《他的国》(2009)、《1988——我想和这个世界谈谈》(2010) 等长篇小说, 并且以“新浪博客”为平台, 从 2008 年开始发表一系列杂文, 戏谑反讽地抨击时弊, 篇篇成为社会热议的话题。社会大众所理解的“韩寒”形象, 基本上是由这一系列时评所勾勒出来的。

体育记者方肇曾经如此评价韩寒的赛车: “韩寒理想的赛车, 就是在危险到几乎失控的边缘驾驶着自己的线路。”^⑫这同样适合于描写韩寒的写作。韩寒写的是一种游弋的“公路小说”, 往往和道路与远方相关, 描绘着不安分的青年游荡者。早在 2000 年, 十八岁的韩寒就表现出对“远方”的向往, 他在《永远的远方》一文中表示苏童的短篇小说《一个朋友在路上》是“近年来唯一一篇让我读了两遍的小说”^⑬。这篇



胶州路火灾现场

小说描写叙述人“我”的好友力钧酷爱《在路上》, 大学毕业后选择做一只“自由之鸟”在中国各地漫游, “冲破围墙到外面去, 去看真实的世界, 去找寻你的自我”^⑭。这个主题显然击中了韩寒的内心深处, 韩寒的小说都是“在路上”的各种变形。笔者就此曾经专门整理过, 在《一座城池》中, 小说第一页, “火车慢慢停下, 这又是一个全新的地方”, 以为自己是“逃犯”的“我”和健叔在陌生的大地上逃亡; 在《光荣日》中, 一群青年自动放逐到远方, 整部小说是一个疯狂的白日梦; “到了毕业分配的时候, 这些人主动放弃了分配, 跟随大麦来到了孔雀镇。一共七个人。大家坐着火车, 摇摇晃晃, 穿过一座山, 再穿过一座山”, 在《他的国》中, 依靠着最后一个变异的大动物萤火虫的照亮, 左小龙在大雾中开着摩托离开故乡亭林镇, 幻想沿着 318 国道穿越中国。《1988——我想和这个世界谈谈》则更为彻底地将故事场景放置在 318 国道, “我”从上海到西藏, 横贯东西, 穿越整片广袤的中国。

和郭敬明自我囚禁的脆弱与忧伤不同, 韩寒的人物,

表征着经历巨变的当代中国价值认同的破碎。郭敬明的人物幻想着海上繁华梦,沉醉在一系列国际品牌与商业地标带来的物质迷幻之中;出生于上海的韩寒,反而拒绝了“上海”所规约的一切,在上海召开世博会前夕,他针锋相对地表示,“城市,让生活更糟糕”(世博会口号:“城市,让生活更美好”)在同题演讲中韩寒直言不讳“我是一个非常非常不喜欢大城市的人”^⑤。如果说郭敬明一直竭力掩饰自己来自四川、努力扮演着“上海人”,那么韩寒则一直强调自己就是“乡下人”,“我的小时候在农村度过,农村的确是个好地方,至少可以放声高歌。”^⑥上海的城市景观对于韩寒也是缺乏魅力的,“如果说城市的建筑是美丽的、值得欣赏的话,我宁愿成天对着一只火柴盒看。钢筋水泥是最没人情味的。”^⑦在《青春》等杂文中,韩寒表示自己关注的是“上海郊区普通人的生活”,他不是从宏大叙述——比如“中国崛起”“浦东模式”——开始,而是从身边的普通朋友出发,一笔一笔算起经济账,面对高昂的房价与物价,这些普通的年轻人未来渺茫。读《青春》,笔者想到的是谁也不会拿来和韩寒比较的赵树理。王晓明曾经这样分析赵树理:“他是一个要替农民算实际的生活账的作家……他也坚信,这个社会主义应该能同时在政治和身体的层面令农民信任,应该能确实地改善他们的生活。他不相信单靠描绘未来图景——无论那多么新、多么美——就能长久地打动农民。必须有实际的数据,才能支持历史的逻辑,光用文字画一条历史进步的逻辑线条,小二黑是不会长久相信的。……1960年代,赵树理笔下再次出现了一批被称为‘中间人物’的形象,他们一径低着头,顽固地算着自己一家一户的小账。”^⑧在《青春》中,韩寒和写《三里湾》的赵树理一样,耐心地计算着本阶级的“账目”,“一个月赚一千五百块”“一个月可以补贴一千五”“他的母亲在给人拧电灯泡,八百块一个月”“但是上海郊区镇上的房子一套至少要五十万”……^⑨和赵树理作为农民阶级的文学代理人相似,韩寒是属于中国正在崛起的中产阶级的作家,他对于公正、自由、民主等社会价值与房价、汽车、电影等具体问题的关注,以及通过博客与微博等网络新媒体与受众的互动与传播,都在不断强化他的中产阶级代言人身份。在一个文学丧失轰动效应的时代,韩寒的文字有如此呼风唤雨的魔力,正在于新兴的历史能量的支持。

韩寒的作品,标志着中国中产阶级的审美倾向与社会处境。这是一个尴尬的阶级,一直被期许为“公民社会”的中坚力量,但在现实中举步维艰。面对社会等级不断凝固与分化的现状,中产阶级无法克服“社会板结”所

导致的参与性危机。尽管上海所代表的中国各大城市在近年来高速发展,但是中产阶级缺乏有效地分享发展果实、有效地参与自身生活的方式,由此缺乏对于共同体的认同。麻省理工学院黄亚生教授结合具体经济数据分析道:“‘上海模式’可以提高城市高楼大厦的楼高和国内生产总值的统计数据,但对提升居民的实际生活水平却是有限的。此外,上海可能是中国贫富差距最大的城市之一。”^⑩黄亚生就此发出严厉地批评,“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都不会像上海一样点燃如此多的梦想,也带来如此多的失望。”^⑪不过,和以往的批判型知识分子不同,关于“中国向何处去”^⑫韩寒没有一个确定的远景,他放弃了关于“乌托邦”的任何迷思。“如果说郭敬明的写作是‘小时代’写作,韩寒则是‘大时代’写作。在一个确定性可疑的世界里,以不确定的方式游弋,韩寒的杂文写作,正是一场属于这个时代的文化游击战。这里的‘游击’不仅仅是比喻意义上的,更是游击的本义,在没有找到自己‘根据地’情况下的游荡、回击。”^⑬

这种写作对应着中产阶级在社会结构中的处境,“游弋”的状态,没有超出一百年前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的论断:“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⑭这也解释了为什么韩寒的作品是反讽性的,如琳达·哈琴指出的,“反讽成了实际抵抗与反对的某种替代”^⑮。反讽开始于“怀疑”,终止于“延宕”,反讽从不引燃任何“革命”。反讽者不满于这个世界,又维持着这个世界,和抱怨相比,反讽者更担心崩溃。“有越大的对立在运行着,也就越需要反讽,以便操纵、控制那些自行其是、竭力冲脱的魂灵。”^⑯反讽最终提供的是关于“自由”的安慰,在《精神现象学》中,黑格尔曾就反讽所具有的知识上的价值进行过深入的阐述……黑格尔显然是说,通过这种讥讽嘲笑,精神就获得了一定程度的自由——我们把这种自由叫做疏离。如果‘存在’可以被这样对待,它似乎不是完全认真的,那么精神受它的约束就比较这样,就可以无所悲伤地接受存在,必要时也可以无所怨恨地与存在打交道。”^⑰在参与性危机的状态下,这种反讽所带来的“疏离感”,会推出一种灰暗而快乐的“自由感”。然而,这远远不够,这会慢慢变成另一种自我囚禁,滑稽而犬儒。在《“80后写作”与中国梦》的对话中,杨庆祥认为:“如果说韩寒的抵抗是成立的,这种抵抗仅仅是在一个非常简单的意义上成立,那就是利用媒体的作用,借助舆论的力量,来满足一种即时性的发泄欲望。这些东西,无法对道德和人性的重构起到有效的作用,也难以说就推动了社会和文化的进步。”^⑱

结语 重建共同体

80后写作,作为城市一代的寓言,归根结底是关于“中国梦”的叙述。在这个意义上,伴随80后文学的崛起以及深远的中国城市化进程,作为中国现代化城市的代表,上海可能凭借这种历史性的力量重新回到中国文化的中心。然而,关键之处在于,如同“纽约梦”之于美国,上海能否提供有说服力的“上海梦”,并且在此基础上升华为中国的核心价值?

情况显然并不乐观,无论是郭敬明的忧伤,还是韩寒的游弋,形形色色的青年,都是无所寄托的“个人”。对于郭敬明而言,以女生宿舍所代表的“关系网络”构筑的“小共同体”,无法摆脱现代的“孤独”,如鲍曼的看法,“正如理查德·桑内特(Richard Sennett)反复指出的那样,共享私密往往是首选的、甚至可能是仅存的‘构筑共同体’的方法。这种构筑技术,只能产生像支离破碎、游离不定的情感一样脆弱短命的‘共同体’,它们毫无规律地变换着目标,茫然无计地寻找永远也找不着的安全港湾;在这些共同体中,人们共享着苦恼、焦虑或怨恨,但它们都是‘钉子’共同体,众多孤独的个体短暂地围绕在钉子周围,并把他们孤独的个体恐惧悬挂在这颗钉子之上。”^⑤对于韩寒而言,游弋的个体最后可能走向韩寒所设想的反面,“倘若个体是公民的头号敌人,倘若个体化给公民身份和基于公民身份的政治带来麻烦,那是因为作为单个人的个体所关心的事情和他们的当务之急占据着公共空间,并宣称自己是公共空间唯一合法的占据者,把其他东西都从公共话语中挤出去了。”^⑥

对于当下中国“个人”之崛起而言,社会学家阎云翔概括为“没有个人主义的个体化”,他以“无公德个人”^⑦指涉个人与共同体的脱嵌。一方面,这是全球性问题在中国的体现,西方学界的“共同体主义”(communitarianism,国内一般译为“社群主义”)与“自由主义”之争,同样讨论的是如何重建“共同体”来应对个人的孤独。另一方面,这个问题带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如阎云翔指出的,“中国个体化的核心是个人与国家之间关系的变迁,而不是西欧那样的个人与社会关系的范畴转型。”^⑧

尽管并不乐观,但就80后一代而言,重建共同体的契机并非没有出现过。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一般被视为80后的成年礼。地震期间,数万青年志愿者从中国四面八方赶往四川,在面临余震与疾病的情况下团结一致、忘我救灾,令以往对80后素有偏见的人群刮目相看,一时好评如潮。诚如当时的媒体评论,“汶川大地震,也是‘80后’的一次嬗变。地震过后,‘80后’在灾难中巍然挺

立。”^⑨不过,也必须指出,这不是常态的团结与认同,而是一种应激性的脆弱的团结,依赖偶然性的、高强度的自然灾害,借助现代的传媒手段所构建的情感共同体。

在政治共同体(个人与国家关系的重组)之外,就更为切近的情感共同体而言,长久而有效地维持,是否可以依赖文学的力量?林·亨特在《人权的发明:一部历史》中开篇即以卢梭《新爱洛漪丝》为例,讨论小说的移情如何使18世纪的读者跨越社会界限,产生情感共鸣,而这构成了人权观念之起源的心智基础^⑩。同样,从“无公德个人”到“有牵挂群体”,当代中国是否有可能通过文化想象的“移情”联系无所寄托的个体。且回到中国现代性的起点,据金观涛、刘青峰考证,第一个使用个人观念的是梁启超:“1895年前中国人对现代个人观念是没法理解的。甲午前翻译的西方著作中,往往根据上下文,将individual译作‘人人’或者译作‘人’,从来没有个人观念的固定而明确的译法。‘个人’这个词宋代以后就在口语中存在,意思为我本人。出现在诗词里面,多指我所爱的那个人,但它不是组成社会的基本单元。有趣的是,在数据库中1899年前大量政治和社会思想有关的文献中却找不到‘个人’这个词。该词在1900年前后出现,一开始意义含混不清,但明显可以感到当时个体意识开始呈现。把‘个人’这个词和西方的individual对应起来是1902年,始于梁启超。”^⑪“1902年梁氏明确说‘国家之主权即在个人’,并在‘个人’这个词下注明‘谓一个人也’,十分明确地表达了西方的个人权利观念。”^⑫

这段话来自梁启超的《论政府与人民之权限》,有意思的是,在梁启超的上下文中,他是批评这种绝对化的个体观念的:

重视人民者,谓国家不过人民之结集体,国家之主权即在个人(谓一个人也)。其说之极端,使人民之权无限,其弊也,陷于无政府党,率国民而复归于野蛮。重视政府者,谓政府者国家之代表也,活用国家之意志而使现诸实者也,故国家之主权,即在政府。其说之极端,使政府之权无限,其弊也,陷于专制主义,因国民永不得进于文明。故构成一完全至善之国家,必以明政府与人民之权限为第一义。^⑬

就政治共同体而言,梁启超指出应该明晰“国家”与“个人”的权限,这正如鲍曼的论断:“没有共同体的自由意味着疯狂,没有自由的共同体意味着奴役。”^⑭这项议题溢出了文学的边界,暂且不论。就情感共同体而言,在同样写于1902年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梁启超将“群治”的希望寄托在“新小说”上:“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⑮梁启超的这项主张,在当时就被视为对于“无

公德”的一剂良药,如安敏成指出的,“梁启超的这些想法迅速被其他具有改良思想的知识分子接纳。譬如王钟麒便写道:‘吾国民所最缺乏者,公德心耳。惟小说则能使极无公德之人,而有爱国心,有合群心,有保种心’。”^⑩

然而,今天回溯晚清,重读先贤的智慧,也要认识到我们是在“现实主义”所代表的宏大叙述瓦解之后重思“想象的共同体”。对于80后所代表的城市一代而言,以文学的方式重建团结,需要经过“反讽”的过滤。相比较一百年前梁启超“新小说”的展望,罗蒂在《偶然、反讽与团结》中所提出的“自由主义乌托邦”对于当下中国或许更有针对性:

本书的目的之一,就是提出一个自由主义乌托邦的可能性:在这个乌托邦中,反讽主义在某种意义上具有普遍性。在我看来,既然后宗教的文化是可能的,那么,后形上学的文化势必也是可能的,而且也是同样可欲的。在我的乌托邦中,大家不会把人类团结当作是必须被承认的事实,亦即必须清除“偏见”或挖掘原本隐藏起来的内在真实,才能认识到的事实。反之,人类团结乃是大家努力达到的目标,而且达到这个目标的方式,不是透过研究探讨,而是透过想像力,把陌生人想像为和我们处境类似、休戚与共的人。团结不是反省所发现到的,而是创造出来的。如果我们对其他不熟悉的人所承受痛苦和侮辱的详细原委,能够提升感应相通的敏感度,那么,我们便可以创造出团结。^⑪(着重号为笔者所加)

由反讽走向团结,一种新型的人与人的关系、人与国家的关系,等待着新一代文学的勘查与激活。在最高的期待上,何谓80后文学,何谓“上海”与“中国”的想象,真意在此。■

初稿于2012年9月

改定于2013年7月

【注释】

陶东风:《青春文学、玄幻文学与盗墓文学——“80后写作”举要》,载《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08年第5期。

在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杨庆祥编选的“80后”小说选中,不选韩寒、郭敬明任何作品,而是集中在甫跃辉(《上海文学》编辑)、马小淘(《人民文学》编辑)等文学体制内的青年作家。

ANDREW JACOBS:《韩寒——写博客挑战体制的赛车手》,《纽约时报》2010年3月12日, http://www.nytimes.com/2010/03/13/world/asia/13hanhan.html?_r=1。该文由RitaLee译成中文。

如吴俊指出的,“在这里之所以要提到新概念作文大

赛,主要原因就是中国当代最新的一代作家、一般称为80后的作家,是以该大赛为契机实现了群体性的崛起,而且也因此产生了自己的代表性作家”。参见吴俊《文学史的视角:新媒介·亚文化·80后——兼以〈萌芽〉新概念作文的个案为例》,载《文艺争鸣》2009年第9期。

赵长天:《从〈萌芽〉杂志50年历史谈起》,载《文艺争鸣》2007年第4期。

赵长天:《绝处逢生说〈萌芽〉》,载《编辑学刊》2004年第3期。

赵长天:《从〈萌芽〉杂志50年历史谈起》,载《文艺争鸣》2007年第4期。在文章中赵长天回忆:“为了让《萌芽》杂志办得更受青年读者的欢迎,我们委托复旦大学社会学系办的一家调查公司,在北京、上海、武汉、广州、兰州五个城市,通过抽样调查的方式,作了非常详细的‘青年人阅读取向’调查,这使我们的改版更有了针对性和目标感。”

赵长天:《从〈萌芽〉杂志50年历史谈起》,载《文艺争鸣》2007年第4期。

王丽:《历史将记上一笔——关于〈北京文学〉与中国语文教育大讨论》,载《北京文学》2000年第10期。

⑩⑪《“新概念作文大赛”倡议书》,见《首届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获奖作品选》(A卷)3页,作家出版社1999年版。

⑬《新思维 新表达 真体验——“新概念作文大赛”征文启事》,见《首届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获奖作品选》(A卷)8页,作家出版社1999年版。

⑭《“新概念作文大赛”倡议书》,见《首届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获奖作品选》(A卷)5页,作家出版社1999年版。

⑮《新思维 新表达 真体验——“新概念作文大赛”征文启事》,见《首届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获奖作品选》(A卷)9页,作家出版社1999年版。

⑯张振胜:《萌芽中的“新概念作家群”向何处去》,载《中华读书报》2004年10月27日。

⑰参见孔庆东、摩罗、余杰等:《审视中学语文教育》,汕头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⑱凡夫:《拯救还是戕害——对〈审视中学语文教育〉的审视》,载《文艺理论与批评》2000年第2期。

⑲李玮:《从“新概念作文”到“青春文学”——论当代文学生产机制作用下“青春文学”审美形态的生成》,载《山花》2010年第12期。

⑳贺桂梅:《人道主义思潮及其话语变奏》,见《人文学的想象力——当代中国思想文化与文学问题》,98页,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㉑陈坚:《〈萌芽〉与浙江文艺社联手再推“文坛80后”》,载《出版参考》2003年第19期。

㉒据我的学生华东师大中文系2010级本科生王泽丰考证,《时代周刊》的报道从头到尾没有出现“80后”字样,而是以

“thelinglei”指代这批青年。王泽丰认为《时代周刊》对“另类”一词没有采取意译而是直接音译,意味着《时代周刊》强调中国青年的另类与美国青年的反叛不同。王泽丰重译了当年报道中一段有意味的说法:“多数情况下,‘另类’像带着电子项圈的狗,明白自己在受制之前能跑多远。没有人越过无形的栅栏。”

②③李阳:《〈萌芽〉的转型与郭敬明的出现》,载《当代作家评论》2011年第1期。

②④参见《〈萌芽〉韩寒在这里一举成名》,http://www.china.com.cn/book/txt/2006-10/26/content_7280479.htm。

②⑤⑥赵长天:《从〈萌芽〉杂志50年历史谈起》,载《文艺争鸣》2007年第4期。

②⑦⑧郭敬明:《关于〈生活在别处〉的生活》,见《左手倒影,右手年华》,211、209、211页,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年版。

③⑨郭敬明:《剧本》,见《首届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获奖作品选》(A卷),325页,作家出版社1999年版。

③⑩莱昂内尔·特里林:《诚与真》,刘佳林译,11页,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

③⑪郭敬明:《假如明天没有太阳》,见《首届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获奖作品选》(A卷),416页,作家出版社1999年版。

③⑫郭敬明:《我们最后的校园民谣》,见《首届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获奖作品选》(A卷),177页,作家出版社1999年版。

③⑬参见《北大教授钱理群:北大等大学正培养利己主义者》,载《中国青年报》2012年5月3日。

③⑭⑮⑯郭敬明:《小时代1.0折纸时代》,4、26、5、108页,长江文艺出版社2008年版。

③⑰居伊·德波:《景观社会》,3页,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④⑱郭敬明:《四维读书之写在前面》,见《爱与痛的边缘》,93页,东方出版中心2008年版。

④⑲郭敬明:《小时代3.0刺金时代》,359页,长江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

④⑳方肇:《韩寒最好的年代》,3页,华文出版社2012年版。

④㉑韩寒:《永远的远方》,见《韩寒五年文集》(下),227页,万卷出版公司2008年版。

④㉒苏童:《一个朋友在路上》,载《上海文学》1993年第1期。

④㉓韩寒:《城市,让生活更糟糕——嘉定区世博论坛演讲稿》,见《青春》,103页,湖南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④㉔韩寒:《兄弟成长于天蓝年代》,见《韩寒五年文集》(下),186页,万卷出版公司2008年版。

④㉕韩寒:《来自海边》,见《韩寒五年文集》(下),185页,万卷出版公司2008年版。

④㉖王晓明等:《笔谈赵树理》,载《文艺理论与研究》2008年第4期。

④㉗韩寒:《青春》,见《青春》,1—3页,湖南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⑤⑸黄亚生:《“中国模式”到底有多独特?》,19、25页,中信出版社2011年版。

⑤⑹来自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著名的设问,这构成了20世纪中国的“元问题”,一代代政治家、知识分子以不同的答案予以回应。

⑤⑺黄平:《“大时代”与“小时代”——韩寒、郭敬明与“80后”写作》,载《南方文坛》2011年第3期。

⑤⑻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见《毛泽东选集》第1卷,9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⑤⑼琳达·哈琴:《反讽之锋芒:反讽的理论与政见》,徐晓雯译,27页,河南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⑤⑽克尔凯郭尔:《论反讽概念》,汤晨溪译,281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

⑤⑾莱昂内尔·特里林:《诚与真》,刘佳林译,118页,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

⑤⑿杨庆祥、金理、黄平:《“80后”写作与“中国梦”》(上、下),载《上海文学》2011年第6、7期。

⑤⑿⑿鲍曼:《个体地结合起来》,见乌尔里希·贝克、伊丽莎白·贝克-格恩斯特海姆:《个体化》,李荣山等译,26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⑥⑰⑱阎云翔:《中国社会的个体化》,陆洋等译,21、376页,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版。

⑥⑳参见《汶川大地震一个月回望:被地震改变的10个关键词》,载《国际先驱导报》2008年06月11日。

⑥㉑参见林·亨特:《人权的发明:一部历史》,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

⑥㉒金观涛、黄晓峰:《金观涛谈个人观在中国的变迁》,载《东方早报》2010年4月4日。

⑥㉓金观涛、刘青峰:《观念史研究——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153页,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

⑥㉔梁启超:《梁启超文集》,138页,线装书局2009年版。

⑥㉕齐格蒙·鲍曼:《生活在碎片之中——论后现代道德》,郁建兴等译,142页,学林出版社2002年版。

⑥㉖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见陈平原、夏晓虹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1897—1916),50—54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⑥㉗安敏成:《现实主义的限制:革命时代的中国小说》,姜涛译,29页,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⑥㉘罗蒂:《偶然、反讽与团结》,徐文瑞译,7页,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

(黄平,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副教授,中国现代文学馆第二届客座研究员。本文系“中国长三角都市群转型发展艺术文化研究”项目成果之一)